

坚持系统集成 营造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

□徐海燕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提出要“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完善维护国家安全体制机制，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以切实保障国家长治久安”。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既关乎人民安居乐业，也关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必须坚持系统集成、统筹发展、健全国家安全与社会治理体系，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构建基层治理共同体，推动社会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中共河南省委十一届九次全会提出了营造“五个环境”，把营造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作为重点，突出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完善体制机制和风险防范。营造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需全盘考量、系统谋划，强化预警防控和源头化解，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

营造安定有序社会环境的价值维度

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不仅是社会治理的目标状态，更在政治、经济、社会多个维度上体现出深远价值。

从政治价值的维度上看，社会的安定有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行稳致远的重要前提。安定的社会环境为政治运行提供制度基础和秩序保障，确保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增强政治生活的规范性与可预期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在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中更能凝聚共识、统筹全局；全过程人民民主在稳定环境下得以全链条、全方位展开，确保人民意志有效转化为国家意志；法治原则在有序环境中得到严格落实，为政治运行提供制度规范和法律支撑。三者系统集成中相互贯通、相互支撑，把党的领导融入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全过程，把人民民主嵌入决策、执行、监督全链条，把法治原则贯穿治理各环节，共同推动政治运行制度化与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方向更加清晰、基础更加稳固。

从经济发展的维度上看，社会的安定有序是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稳定的社会环境为市场运行提供规则和秩序，确保资源配置高效有序，增强市场主体的预期稳定性与发展信心；畅通的产业链、供应链在安定环境中得以保持完整与安全，为宏观经济平稳运行提供支撑；有序的市场竞争与产权保护则为资本投资、企业创新和消费扩张创造良好条件。同时，坚持市场为导向，兼顾政府调控、社会协同与科技赋能，能够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实现平衡，促进经济运行既保持活力，又具备韧性和可持续性，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从社会价值的维度上看，社会的安定有序是实现和谐与公共福祉的重要前提。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最大底气 and 最深厚的根基，只有在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中，群众的安全感、获得感与幸福感才能真正落地。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不仅为公共生活提供安全感和可预期性，保障基本权利与社会公平，还能增强群体间的信任与合作。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使社会矛盾能够通过制度化渠道得到有效化解，公共资源得以公平分配，社会流动保持顺畅，不断凝聚社会共识，提升整体向心力，由此形成强大的社会凝聚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

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既承载政治、经济与社会三重价值，又在实践中形成相互支撑、良性互动。政治稳定确立制度规则与秩序，经济发展提供资源条件与物质支撑，社会和谐凝聚心理认同与社会信任。三者相辅相成，共同塑造可持续发展的治理格局，使安定有序不仅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目标，更在国家治理与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稳定器”和“压舱石”的关键作用。

营造安定有序社会环境需坚持系统集成的治理思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涉及党和国家工作全局，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涉及许多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营造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同样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强耦合特征。从经济与社会层面看，就业不稳、分配矛盾与基本公共服务短板并存，直接影响社会的预期稳定；从治理层面看，政府与市场在规则统一、要素流动、公共资源配置等方面仍存在错位，多头执法、地方保护和程序衔接不畅，使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在诸如新业态治理、信访处理和基层减负等场景中呈现紧张状态；从安全层面看，极端天气、公共卫生、金融与网络安全等风险具有链条化、跨区域传导特征，都市圈功能空间与行政边界错配推升跨区域协同成本，数字化转型又受数据孤岛、标准不一与算法偏见的制约。这些问题相互牵连、彼此放大，凸显出构建安定有序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和系统性。

面对多重挑战，坚持系统观念是化解矛盾、统筹发展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这意味着必须将经济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发展与安全置于同一坐标系中加以统筹，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碎片化治理。通过整体谋划与系统布局，把各方面改革举措相互衔接、协同高效，方能避免部门最优导致整体失衡，将零散努力转化为可预期、可持续的社会规则与公共秩序，实现社会稳定与有序的动态平衡。

坚持系统集成的最终目的，是把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转化为安定有序和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能。其内在逻辑在于，把统筹、协同与闭环管理贯穿于社会治理全过程，把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宏观目标与微观场景紧密结合，打通跨区域、跨部门的业务链与数据链；同时，将预防、预警、处置、恢复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深度耦合，实现风险治理的全周期闭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应该既充满活力又拥有良好秩序，呈现出活力和秩序有机统一。因此，唯有坚持系统观念，推动协同发力，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才能真正形成安定有序、稳定与活力并举的现代化治理格局。

营造安定有序社会环境的实践逻辑

营造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并不是自发生成的自然状态，而是国家治理体系高效运转、制度优势充分发挥的结果。它既体现为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的综合成果，也集中反映在制度执行力和治理能力的有效运作之中。营造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既需要中国共产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提供坚强政治保障，确保改革发展始终沿着正确方向推进，也需要不断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制度优势持续转化为治理效能。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充分发挥制度设计与治理方式，强化风险防控与社会调适，发挥基层群众的主体作用，形成上下贯通、左右协同的治理合力。营造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实质上是一个兼顾政治目标、制度运行与风险调控的系统工程。具体而言，其实践逻辑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目标导向与价值指引的有机统一。在目标导向层面，党的全面领导为营造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提供了根本政治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通过制度化安排，把政治意志转化为治理实践，将国家发展战略与社会秩序构建紧密结合，使社会稳定与党的长期执政目标高度一致。由此，安定有序不仅是社会治理的阶段性成果，更是国家长治久安与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

在价值指引层面，党的领导通过党建展开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和群众动员，把安定有序转化为社会的共同愿望与自觉行动。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引导社会成员在日常生活与治理参与中形成对秩序的认同。通过组织体系覆盖城乡与各类社会领域，把党的价值理念传递到社会“最后一公里”，逐步将安定有序由外在要求转变为社会成员的内在认同和积极实践。

目标导向与价值指引相结合体现在党的政治目标通过组织体系落实到社会治理的各个环节中，而价值指引则将这种目标转化为社会共识和群众行动。在这一过程中，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依法治理、社会协同参与形成合力，把政治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把制度设计转化为社会认同，使安定有序不再是单向度的外在管控，而是逐渐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基层治理共同体。这正是目标导向与价值指引有机统一的生动体现。

第二，制度供给与治理方式的良性互动。安定有序并非不是自然生成的状态，而是依靠国家和社会通过制度安排来维系和塑造的。制度供给通过确立一整套长期稳定、具有权威性的规则体系，把社会运行纳入可预期的轨道，从而实现秩序的稳定性与社会关系的协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制度供给主要体现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协商民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和法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的运行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通过选举代表行使国家权力，在立法与监督中体现制度供给的权威性；协商民主制度通过多元参与提升决策的科学性与包容性；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则把制度供给下沉到社区和村庄，使治理触角抵达社会最末端；法治制度更是通过完善的法律体系与严格的司法实施，为社会稳定提供底线性的制度保障。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制度供给是一种“顶层设计”的体现，它通过制度安排为治理运行提供可依循的规范框架，使安定有序成为可能。

但制度本身只是“纸面规则”，唯有依靠科学、灵活与协同的治理方式，才能发挥效能。在新时代，系统集成的治理方式已成为安定有序社会环境的重要路径：首先是通过数字治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信息处理和风险预警，实现治理智能化；其次是推动协同治理，把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和个人纳入治理体系，形成多元互动的良性格局；最后是强调全过程人民民主，确保决策以民为本，由民参与。从而把制度原则转化为现实秩序，使制度优势真正落地见效。

制度供给与治理方式的结合，体现了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的转化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执行力是制度优势能否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关键。制度供给确立方向与规则，治理方式决定落实与成效。缺乏制度供给，治理易陷入随意化、碎片化，难以形成长效机制；缺乏相应的治理方式，制度则可能停留在纸面，难以发挥作用。唯有二者结合，才能贯通顶层设计与实践运行，推动制度原则转化为高质量高效的社会秩序。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治理提供根本框架，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协商、参与和监督确保制度落实，法治制度为社会运行确立基本规范，而数

字治理与基层自治则增强了制度的可操作性与社会认同度。可以说，制度供给与治理方式的有机结合，不仅是安定有序社会环境的制度支撑，更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途径。

第三，风险治理与动态平衡的协同并进。风险治理是安定有序社会环境的必要前提。安定有序并非静止不变，而是在不断应对风险和不确定性中进行塑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把防范化解国家安全风险摆在突出位置，提高风险预见、预判能力，力争把可能带来重大风险的隐患发现和处置于萌芽状态。这一论述表明，风险治理不是局部问题，而是关乎全局与长远的系统任务。由于社会风险往往具有链条化、放大化和跨越性特征，一旦失控，不仅冲击局部，更会威胁整体稳定。因此，必须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治理关键在于前瞻性制度化：既要通过风险识别、监测和评估提升预判能力，也要通过制度设计和责任分工，使风险治理走上法治化、常态化轨道。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正体现了这一理念，通过源头预防与基层调解，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避免陷入事后维权的被动。换言之，风险治理是安定有序的底线工程，直接关系到社会能否长期稳定。

动态平衡是风险治理的基本形态。其难点在于如何兼顾多重目标：在数字治理中，政府既要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创新和产业活力，又要防范数据泄露与算法偏见；在社会政策中，既要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又要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同时，还需发挥德治与协商机制的柔性作用：德治通过涵养社会心态、培育诚信文化，为秩序注入温度；协商则依托社区议事会、行业协会等制度化渠道，将多元诉求协调统一。动态平衡强调治理的灵活性与适应性，使社会既能保持必要的弹性，又能维持长久的稳定，从而推动风险治理由被动应对走向主动调控。

实现风险治理与动态平衡的统一，关键在于系统集成与闭环运行。必须将二者放在同一坐标系中统筹考量，协调经济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发展与安全，避免因追求局部最优导致整体失衡。在运行机制上，应构建涵盖预防、预警、处置、恢复的闭环体系：预防奠定制度与源头管控基础，预警依托数字化监测实现风险感知与预判，处置依靠多元协同确保应对高效有序，恢复通过制度修复和秩序重建促进社会快速回归常态。四个环节相互衔接、协同作用，使风险治理真正转化为社会安定有序的持久支撑。唯有如此，才能在风险可控与秩序可持续的格局中，实现“既充满活力又保持良好秩序”的现代化治理共同体，为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繁荣稳定提供坚实保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

新时代文化建设对传统体用观的超越

□冯德顺

“明体达用，体用贯通”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特质，以哲学的语言精准地阐释了这一思想蕴含文化理论上的创新突破，又有文化工作上的布局部署；既有思想理念层面的认识论，又有实践操作层面的方法论；既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实践经验的生动总结，又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最新发展，形成了科学系统的思想体系，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我国文化建设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坚持什么原则、实现什么目标等根本问题，全面铺展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基本框架和整体布局，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为深入推进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全面指引。

值得注意的是，“明体达用，体用贯通”这一描述本身就带有浓厚的中国特色，来源于中国哲学的思想传统，又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既是对中国传统体用观的超越，也是对近代以来思想界体用之争的一次完美回答。

“体用之争”的由来

“体”和“用”是一对中国哲学的特有范畴。与西方哲学中善于抽象的理论推演不同，中国哲学善于用具象的形体或简单的事物来解释本质的道理甚至描述复杂的规律。比如《易经》就是通过八个简单符号的排列组合去揭示宇宙之间最为深刻和本质的道理。所以，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体”指根本原则、内在目的，而“用”则是指具体方法、外在手段。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里，哲学就是要回答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问题，认识世界的本源就是“体”，改造世界的方法就是“用”。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从古至今，不管思想家是否采用“体”“用”这样的表述，都不可避免地对其作出过解释。

“明体达用”作为一个完整的表述，最早出现在《宋元学案》中，用来形容宋代思想家胡瑗的教育思想。在宋朝知识分子的观念中，“体”与“用”有着明确的含义：“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变者，其体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这一观念，在理论上是为了维护儒家意识形态，实践中是为了巩固国家一体的政治秩序，由此可见，“体”和“用”在中国传统中天然是一体的。在漫长的封建王朝时代，深受儒家思想浸润的中国知识分子，就是

在实践着“忠君爱民”的用，来维护“等级秩序”的体。

晚清以降，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迫使中国被纳入了“世界历史”，“西学东渐”在当时也被赋予了救亡图存的含义。面对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面对东方落后于西方的现实情况，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开眼看世界，学习了西方的科学技术乃至是思想文化，进而将西学与中学进行对比，于是在对待两种文化的态度上就出现了不同的观点，尤其是在如何学习西方的问题上产生了争论，表现为近代中国思想界著名的“体用之争”。

“体用之争”的分歧

“体用之争”的分歧主要在于“古今中西”之争，说到底就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救亡图存，以及救亡图存的方向是什么的问题，而这两个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实践问题，而不单纯是一个理论问题。

晚清最保守的理学家们，不管是“体”还是“用”都坚守中国传统，而一批具备良好西学基础的学者比如辜鸿铭，在对上了中西思想之后也走上了回归传统的道路，要将“中体中用”坚持到底。不过这些学者大多是坐而论道的清流之辈，他们的观点也只能代表一部分传统知识分子的认知。

而以洋务派为代表的一批开明知识分子在战争中发现，西方赖以纵横世界的主要是他们的坚船利炮，于是萌生了用西方器物维护中国道统的想法，即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曾国藩到李鸿章、张之洞，这些地方督抚在剿灭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在发展自身实力的过程中，渐渐尝到了西方技术的甜头，并逐渐发展出了一套“中体西用”的理论，而且在“用”的理解上，渐渐由单纯的“器物”层面进步到了“制度”层面。这一思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甚至占据了思想界和实务界的主流。

直到新文化运动时期，以年轻留学生为主的新派学人认为中国落后的根根恰恰就在于文化，器物层面和制度层面的变革是不够的，必须“打倒孔家店”全盘推翻传统文化，彻底改造中国人的思想，“全盘西化”才能融入世界大潮，所以新文化之所以能成为运动，就在于试图彻底改造中国人的思想，并为了这个目的采取了一系列举措，试图用西方的“用”在中国建构一套西方的“体”。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知识分子也看到了

“中体中用”的保守、“中体西用”的肤浅以及“西体西用”的水土不服，以李泽厚为代表的思想家试图将“中体西用”和“全盘西化”融为一体，提出一种所谓“西体中用”的主张，这种调和主义的观点，自然也无法从文化上解决中西之争、体用之争，从而未能在思想界占据主流。

这些争论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几乎成为中国知识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但之所以没有能够得出一个让所有人都信服的结果，关键在于缺少实践的支撑。所以严复就已经认识到“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亡”。所以硬要“中体西用”，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在实践中反复碰壁，而固守“中体中用”就是继续走僵化落后的老路，彻底的“西体西用”又根本无法在中国大地上生根。

今天再去回顾近代中国这场“体用之争”，不难发现近代学人学习西方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但无论这种文化上的渐进和反思怎么调整，这几种“体用观”总是不能取得实质性的效果，究其原因，根本在于割裂了“体”“用”之间的辩证关系。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文化上的结合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生硬的相加只能引起互相排斥；而应该是深刻的化学反应，有机的融合才能形成有益的成果。没有“体”，所谓的“用”就没有坚实的理论根基；没有“用”，本体再深刻也只是头脑中的空谈，根本谈不上改造社会。所以即便学者们在理论上推演出了一套又一套自圆其说的道理，不与中国现实的土壤相结合，也不可能真正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要真正理顺“体”和“用”的关系，就只能靠实践，跳出固有思维的窠臼，用中国人自己的实践去形成中国理论。

“体用之争”的超越

而真正实现用中国实践升华为中国理论，最典型的代表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在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文化思想博大精深，就是说这一思想是基于文化本身多层次、多角度的特征来考量的，另一方面更源于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发展的思考本身就是体与用、道与策的统一。

一是贯通“国运”与“文运”。近代以来中国人学习西方，归根结底是要解决中国问题，但中国人的思想变革与中国的社会发展之间究竟是

什么关系，习近平文化思想给出了明确的回答。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一系列重大文化工程扎实推进、重要文化机构构成组建、重要文化地标顺利落成，全社会的文化意识、文化热情明显增强。所以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把文化建设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不是一句空话，这既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自觉。

二是打通“根脉”与“魂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我们用了17年，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经历了许多挫折之后意识到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用马克思主义来化中国，不过受形势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在当时主要还是指导革命的理论，发展理论的当务之急是解决革命道路的问题。而从建党到我们真正提出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也就是明确将结合的深度推进到思想文化层面，我们用了100年。当然我们必须清楚的是，“第一个结合”与“第二个结合”并不是割裂的，中国具体实际必然包含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但我们能够从自发到自觉，甚至从自觉到自为地在理论上论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本身就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发展达到了一个更深、更新也更具现实意义的层面，从这几个角度讲，习近平文化思想已经解决乃至超越了近代中国的“体用之争”。

三是联通“明体”与“达用”。“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最直观的体现还是在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辩证统一上。立体的容易，合用的容易，明体达用不容易，在明体达用的基础之上，又要做到体用贯通，关键就在这个贯通上。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一系列重大创新观点，包括：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坚持“两个结合”；担负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坚定文化自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价值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掌握信息化条件下舆论主导权、广泛凝聚社会共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等12个方面的重大创新观点，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基础性、原则性内容，集中体现了这一重要思想在理念上的创新、价值上的引领、思路上的突破。这每一个方面的创新观点，都来自对现实问题的回答，而是在现实中真正解决这些问题又需要实践路径的指引。另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还涵盖了一系列战略部署，包括：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工作体系；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融入社会发展、融入日常生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加快构建融为一体、合而为一的全媒体传播格局；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出更多同新时代相匹配的文化精品；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打造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队伍等16个方面的战略部署，体现了目标与路径的一致、宏观与具体的融合、整体与重点的统一，彰显着鲜明的问题导向和实践导向，全面铺展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基本框架和整体布局，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

要真正解决近代以来思想界的“体用之争”，最关键的不是在头脑中构建出一套玄而又玄的理论体系，而是要在实践中找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习近平文化思想来源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实践经验，形成于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由“两个结合”推动文化发展的实践过程，也必将在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彰显真理伟力。习近平文化思想正是在实践中当把“体”和“用”贯通了起来，超越了近代中国的“体用之争”，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深刻阐明了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问题，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了总方针、总遵循、总要求，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新境界。

(作者单位：中央宣传部全国宣传干部学院教研部)